

# 《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的创伤表现、 根源与自我修复解析

余小蕊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外语系,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 小说《长日留痕》书写了主人公史蒂文斯所经历的家庭创伤、爱情创伤、事业创伤、战争创伤, 描述了史蒂文斯6天驾车旅行自我修复创伤、最终实现自我和解的心路历程。《长日留痕》表达了石黑一雄对创伤人群命运的同情悲悯之心, 既是石黑一雄文学的里程碑之作, 也是启迪我们重新思考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现代经典之作。文章聚焦于小说对主人公史蒂文斯的创伤书写, 解读主人公史蒂文斯所经历的创伤和自我修复过程, 进而为现实生活中的创伤修复过程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长日留痕》; 史蒂文斯; 创伤; 修复; 石黑一雄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4-0067-09

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 1954—) 是一位享誉全球的日裔英国作家, 出生于日本长崎, 后随父亲定居英国。他先后获得了英国惠特布莱德图书奖 (1986)、英国布克奖 (1989)、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 (1998)、诺贝尔文学奖 (2017)。《长日留痕》是石黑一雄创作的第三部小说, 其一经出版便获得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布克奖。小说《长日留痕》是一部关于情感得失与疗愈的小说, 书中的主人公史蒂文斯一生忠于管家事业, 因忙于工作而错过与父亲临终告别, 因恪守管家职责而与爱情失之交臂, 因忠实于主人而没有及时纠正主人的种族主义错误, 先后经历了亲情的缺失、情感的压抑、事业的没落、帝国的变迁四大创伤<sup>[1]</sup>。主人公史蒂文斯通过6天的自驾旅行, 寻找人生的答案; 在自驾旅行中他通过日记回忆自己的经历, 重现创伤过程, 进而修复创伤, 认可了自我的价值, 最终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迎接新的生活。为了更深刻地探讨《长日留痕》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本研究将聚焦于小说对主人公史蒂文斯的创伤书写, 解读主人公史蒂文斯所经历的创伤

和自我修复过程, 进而为现实生活中的创伤修复过程提供有益参考。

## 一、创伤理论与《长日留痕》

“创伤”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损伤”(Wound), 最初意为“肌肤的疤痕”。作为一种常见的研究范式, 创伤理论起源于19世纪英国工业事故创伤相关的临床医学与19世纪末的现代心理学; 经过理论内涵不断深化和发展, 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理论, 创伤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 而是扩展到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 主要关注妇女、儿童、跨族裔、移民、少数民族等社会弱势群体<sup>[2]</sup>。弗洛伊德是创伤理论公认的奠基人, “创伤”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早期理论研究的核心, 他在《精神分析导论》中对创伤进行了完整的定义, 并对创伤病人相似的病症进行了描述。凯西·卡鲁斯强调“创伤”具有入侵性强、后延性强和强制性重复的特征; 朱迪思·赫尔曼也强调“创伤”对人的影响是持续性的, 会导

**[收稿日期]** 2023-11-27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战后英国学界小说的物质书写与民族认同研究”(FJ2022C013); 教育部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智慧学习环境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230706363302922)。

**[作者简介]** 余小蕊 (1981—), 女, 福建福州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英美文学研究。

致人处于无助状态<sup>[3]</sup>。创伤的发生一般都是难以预料的,并且具有极强的危害性,会使受害者对自己产生怀疑,进而对家庭、朋友、社群成员产生隔阂,出现持续的过度恐惧、担心和愤怒,甚至完全否定自我而陷入充满生存危机的深渊中<sup>[4]</sup>。但是这种影响在受害者遭遇创伤时并不一定马上反映出来,而是很有可能会延迟,并且以不同方式在以后的生活中显现出来——文学便是其中一种方式。创伤和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创伤有时候是文学创作的助燃剂”,促使一些遭受过创伤的作家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比如,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作为奥斯维辛囚犯亲身经历了“奥斯维辛事件”,导致其心理遭受极大创伤。后来,作者以文字的方式对这些心理创伤进行回忆与反思,从而创作出《活在奥斯维辛》《休战》等经典作品。另一方面,“创伤是个体无法避免的生命体验”,创伤文学创作有助于遭受过创伤的作家将自身苦痛通过文字发泄出来。比如,《社戏》中的“我”以逃避与回忆的方式进行创伤治疗,而鲁迅写作《社戏》本身就是一个摆脱阴影、治愈创伤的过程。通过呈现人物的创伤经历和心理反应,创伤叙事作品可能引发社会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反思。这些作品提供了一种途径,让人们理解和同情那些受到心理创伤影响的人,并促使社会在应对这类问题时采取更为人道和有效的措施<sup>[5]</sup>。

创伤是石黑一雄作品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其小说中孤独的主人公忏悔的回忆叙述,总带着强烈的负罪感,这些人从出场开始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记忆,一生都在创伤中度过。作为石黑一雄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长日留痕》一以贯之地运用了作者最擅长的叙事视角——回忆,而这回忆又如他所有作品所体现的那般,是一段痛苦得不忍回望而又纠缠不脱的创伤记忆<sup>[6]</sup>。石黑一雄笔下关于大英帝国的衰落之殇,藉着一位勋爵管家的旅行日记向读者娓娓道来。石黑一雄也许受到了日本文学“物哀”的影响,笔下的人物总是举止得体、行为含蓄,但其中无不透露出对于逝去时代的惜别和对于时代变革的无措。《长日留痕》创作的时代背景是二战后的英国,二战使英国“元气”大伤,无力维持其宗主国地位,反殖民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

高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英国人的怀旧情绪油然而生。而以“做伟大管家”为人生目标的史蒂文斯,目睹了他曾经服务的英国贵族主人无可挽回的衰落,又苦恼于他所服务的府邸迎来的新主人——美国人法拉戴先生带来的文化差异;出于专业精神史蒂文斯竭尽全力满足新主人的要求,但法拉戴先生的反馈给他带来严重困扰,史蒂文斯不但怀疑自己的业务能力下滑了,他还陷入了对过往荣誉的怀疑——对自我的怀疑和对自己经历的怀疑。这些苦恼和怀疑具象化了一个努力想让自己靠近美国新主人的英国旧管家的身份认知困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作者石黑一雄的内心写照<sup>[7]</sup>。作为一名英国籍的日本后裔,不知道作者在融入英国社会时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惑和认同焦虑。石黑一雄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将读者带入主人公史蒂文斯的意识之中,去感受其内心深处的孤独、怀旧和怅惘,以及隐藏在这些情绪背后的那份对人类的关怀和对人性的渴望。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大抵在于石黑一雄用极其细腻的情感和笔触刻画了一个在时代洪流中无所适从的小人物,并见微知著,为大英帝国无可挽回的衰落唱响一曲哀婉的挽歌。当然,哀伤的情绪也不是全部,在小说结尾,大英帝国传统管家文化的遗珠史蒂文斯先生重拾了心情,最终与自己和解。

## 二、《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的创伤表现

### (一) 家庭创伤:亲情的缺失

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一再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并且做出许多让人觉得遗憾的行为,这和他家庭亲情的缺失有着必然的联系。提到“家庭”一词,人们通常会想到温暖、港湾等词汇。然而,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一家面临着亲人离散、父子关系疏离的问题。从现在的家庭结构和日常生活来看,他们的家庭关系是不健康的,与亲人分离和无法融入集体属于结构性创伤,这也导致史蒂文斯的创伤记忆在童年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史蒂文斯从未回忆起关于他母亲的事。家庭中的女性角色对塑造儿童健康人格至关重要,然而,文中

暗示了史蒂文斯的母亲对他的关爱不够、影响甚微，史蒂文斯的生命中缺乏“母亲”这个角色；儿童时期所经历的母亲缺席、母爱缺失不仅容易引发创伤性体验，而且会形成难以消失的创伤记忆<sup>[8]</sup>。

父亲和母亲是家庭生活的两大支柱，一旦其中一根断裂，另一根就会在孩子未来的生活中变得尤为重要。母爱的缺失让史蒂文斯对父亲关爱的渴望变得相当强烈。遗憾的是，他从未感受到亲情的温暖，而是在童年时期就成为了父亲的囚徒，遭受了精神上的暴力，这更是加剧了他的创伤。史蒂文斯父亲是一位攻击性的父亲，同时也是社会剥削的受害者。由于职业性质的限制，他形成了一种将满足他人需求置于个人需求之上的生活观念，还把这种观念强加给儿子，使史蒂文斯失去了自由意志。史蒂文斯的兄长伦纳德在南非战争中丧生，使得家庭再次面临破碎。亲人的突然离世是一种极其痛苦的经历，兄弟情谊的断裂也对个人成长造成了伤害。听到兄长去世的消息后，史蒂文斯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而史蒂文斯父亲压抑了自己面对亲人突然离世的痛苦情感，对长子的死显得过于冷漠和麻木。亲人离世对史蒂文斯的父亲是创伤，对史蒂文斯也是创伤，导致其坚信事业就是一切，完全容不下家庭情感的空间。

受创伤者表现出的冷静其实是被动服从。伦纳德的死不是国家荣耀，他死在一次臭名昭著的军事行动中。更糟糕的是，战争结束10年后，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职指挥官前来拜访达林顿勋爵。尽管憎恨这位将军，史蒂文斯父亲还是选择抑制个人情感、履行职业职责，悉心照顾这位“举止毫无教养、言谈话语粗鲁不文明”的客人。史蒂文斯父亲成为史蒂文斯学会抑制自我情感的最初启蒙者，导致他变成一个自我麻痹的工作狂。可怕的家庭创伤一直潜藏在史蒂文斯的记忆深处，并在父亲去世时达到顶峰。史蒂文斯在忙碌的工作中得知父亲逝世，作为儿子的他本应陪伴在父亲身旁，但他却在事业与亲情间选择了前者，未曾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弗洛伊德认为，由环境影响造成的激烈因素是导致创伤的重要因素之一，如面对死亡、遭遇遗弃、失望和错位等，父亲的去世无疑是一道创伤记忆，给史蒂文

斯带来巨大的影响。

美国作家苏珊·福沃德博士在《原生家庭》一书中曾言：“不健康的家庭体系，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连环追尾，其恶劣影响会代代相传。”<sup>[9]</sup>在当今社会，“原生家庭”一词被频繁提及，成为许多个体创伤的源头，家庭环境养成的个体性格成为一些情感以及事业创伤的源头或者催化剂。家庭女性成员的缺席和主要成员的去世使得史蒂文斯一家面临着亲人离散的巨大悲剧，而父子之间的关联却只有对职业尊严的执着。在史蒂文斯家庭中，父亲专制而冷漠，母亲与爱的形象相去甚远，连最基本的亲情都成了伤害心灵的武器。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中，史蒂文斯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凄凉冷漠的，他从未享受过一丝温暖和幸福。亲情的长期缺失导致了史蒂文斯冷漠的言行举止，而外在的冷漠表现代表其内心的恐慌与保守，在遭受巨大的苦痛时最终造成了无法避免的情感创伤。

## （二）爱情创伤：情感的压抑

爱情是一个神圣而永恒的主题，是人类最崇高的情感之一，它让人们变得温柔、乐观、舒适和快乐，是一种灵魂深处最美好的体验。爱是人的天性，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是人类的天性，是正常人性的体现。在私人生活方面，童年的创伤记忆导致史蒂文斯未能体验到真正的亲情、爱、温暖，也造成史蒂文斯不懂得如何爱人、如何表达爱。在他看来，一个出色的管家不应该分心于爱情或私人感情，因此，他选择了独身，将自己的情感压抑得十分彻底。童年的创伤记忆使史蒂文斯一直抗拒两性之间的情感关系，在史蒂文斯的回忆中多次谈及这一议题。最早涉及两性情感是他提及达林顿府前女管家和男副管家决定结婚并且辞去工作，他认为“这一类的男女关系”会严重威胁整幢宅第里的工作秩序，尤其是此类婚姻事件如果是“发生在地位较高的雇员之中”则可能会对工作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对情感的压抑、婚配的抗拒最终使他与肯顿小姐的爱情无疾而终，肯顿小姐嫁作他人妇，造成了创伤的延续<sup>[10]</sup>。

肯顿小姐是小说中达林顿府的女管家，她性格活泼开朗，是唯一让史蒂文斯敞开心扉的女人。但是，他们之间一开始并不融洽，甚至还为



工作发生了激烈争吵,只能通过传递纸条来交换工作信息。父亲的突然中风让史蒂文斯不知所措,善良的肯顿小姐不仅替他照料父亲,而且适时安慰可怜无助的史蒂文斯。肯顿小姐的善解人意、体贴温柔让他体验到久违的女性温暖,是史蒂文斯生活中的一抹阳光,他们之间的爱情开始发芽,在每天的空闲时间一起在肯顿小姐的起居室喝茶聊天。然而,小说中史蒂文斯言语间始终没有将自己对肯顿小姐的爱意直接流露出来,而是一直含糊其词地掠过二人的情感部分。创伤理论强调压抑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在个体遭受创伤时可以帮助其克服情绪、保持理性。但是,被压抑的内容并不会完全消失,会以另一种替代性的或伪装的行为表现出来。童年的创伤经历使史蒂文斯将自己的全部情感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习惯将自己意识里的情感欲望压抑到潜意识中去,导致他一直隐匿自己对肯顿小姐的感情。

尽管肯顿小姐多次展现深情,例如,捧着花瓶前来茶水间,或紧紧靠近询问他正在读的书,史蒂文斯却始终坚持拒绝,强调茶水间不是娱乐室,甚至在肯顿小姐遇到烦恼时,他也表达出冷漠的态度。小说一开始,史蒂文斯就提及肯顿小姐,他的言辞中流露出对肯顿小姐深深的思念。然而,时间不可逆转,在小说的结尾,他们在汽车站分离,注定永远错过对方。史蒂文斯一直怀有对肯顿小姐的深深爱意,但却将这份爱重重深锁于潜意识之中。他的情感之痛是无形而持久的,让他的心中存在一道无法消除的裂痕。小说的结尾揭示了他们将永远分离的命运,史蒂文斯注定要孤独地度过余生<sup>[11]</sup>。

史蒂文斯并非没有爱与被爱的需求,只是童年时期的创伤记忆让他始终压抑自己的情感,习惯以逃避的态度对待情感。为了追求管家的尊严,史蒂文斯抵制情感的诱惑,放弃了享受生活和爱情的权利,最终失去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他无法勇敢地直面真实的情感和欲望,只以冷漠的表面示人,最终失去了心爱的人。史蒂文斯在旅途中一直深陷创伤记忆里,他的爱情和希望如同落日余晖一样逐渐消失,爱情创伤记忆永远缠绕于心<sup>[12]</sup>。

### (三) 事业创伤:事业的没落

如果说父亲去世、肯顿小姐离开对史蒂文斯

造成的亲情、爱情创伤是他忠于职守而被迫经历的创伤,那么事业的没落则是对他最致命的打击。管家工作是史蒂文斯生命中的重心,除了父亲一直给他灌输要成为“有尊严的管家”,他自己也一直追求成为“最优秀的男管家”。在长达35年的管家生涯中,史蒂文斯追求尊严,迷信权威,将“职业尊严”视为最有意义的目标,认为满足主人的需要是维护尊严的最低要求。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成为唯命是从的仆人,将完成主人的任务当成自我肯定的条件。在为达林顿勋爵服务时,他在宴会上承受了贵宾斯宾塞先生关于他不知道的国际贸易和外交问题的故意刁难,但他还是无怨无悔地完成了接待任务。如果说1923年在达林顿府召开的这场“非官方”国际会议是史蒂文斯职业生涯的转折点,那么1936年那场足以“改变世界局势”的秘密会晤就可以看作是他“职业成就的顶峰”。但是,史蒂文斯所谓的职业成就是不全面的、畸形的,是以放弃重病将逝的父亲、深藏对肯顿小姐的爱意为代价的<sup>[13]</sup>。

对于达林顿勋爵的信任一直是史蒂文斯信仰的主要部分,但当得知达林顿勋爵是纳粹政权的支持者时,史蒂文斯的信仰崩溃,为人类服务的梦想变成了一场充满死亡的人生噩梦,毕生追求变得虚幻,这是毁灭性的苦痛。府邸易主后,史蒂文斯被达林顿勋爵看作“包裹的一部分”或“一件赠品”一同“移交”给法拉戴先生。史蒂文斯难以接受美国人法拉戴先生的言谈和处事方式,面对新主人时挣扎着想要在工作上追求完美,但却频出疏漏,这严重挫伤其自信心和职业“尊严”,对他而言更是个巨大的失落和痛苦。一旦创伤出现,随之而来的便是受创者的身份认同危机。史蒂文斯在思考如何完美地履行职责时陷入焦虑,努力弥补却收效甚微,使他的私人生活和情感生活都受到了压抑。在旅行时,史蒂文斯的尊严精神禁锢了他,他在着装上过于拘谨,无法摆脱虚假身份,甚至在小村庄中也沉浸于以旧时荣誉为荣的炫耀中,无法摆脱虚假的自我。

总而言之,恪守职责、追求所谓职业尊严、抵制来自于外界的各种诱惑是史蒂文斯无法放弃的行为,也是他觉得管家职业上应该遵守的条规,但是这些行为使他最终失去了人性的美好。

史蒂文斯一生的悲剧来源于他对陈旧观念的偏执理解及不当执行，将过时的职业价值观视为生命的意义，却贬低甚至放弃了人性美好的一面，放弃了个体生命真正的尊严。史蒂文斯无法战胜自己，难以直面自己真实的情感和欲望，最终沦为一个不合时宜的迷失者。

#### （四）战争创伤：帝国的变迁

创伤叙事在文学中通常表现出一种对事件及其后果的深度探索，主角的角色通常被塑造为特定历史时期中某些人或特定文化、种族和性别所经历的集体创伤的代表。在文本中，我们能够观察到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这段时期，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帝国霸权崩溃的漩涡中。战争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给他们留下持久的阴影。一战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社会政治破坏。战后，英国政治家和公众采取了“绥靖政策”，试图通过维护和调解来避免战争。达拉顿勋爵在这一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在国内举办私人会议和聚会，成为英国和德国之间的重要调停人。然而，这种“绥靖政策”未能阻止二战的爆发，战争导致英国失去了世界霸主地位。在剧烈的变革中，英国贵族阶层衰落，失去了昔日的优越感和荣耀。“绥靖政策”的失败使得那些曾经英勇无畏的英国绅士们为自己的选择感到羞愧，特别是在达拉顿勋爵成为替罪羊被指控叛国的时候。

1956年，法拉戴先生接管了达拉顿府，象征着战后全球权力结构的重新分配；达拉顿府成为了英国历史的象征，管家史蒂文斯见证了社会历史动荡的同时，似乎成为了一具活化石。英国在世界舞台上失去了霸主地位，社会价值观也经历了巨大转变。一些英国人试图保持传统的绅士和贵族身份，维持他们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而另一些英国人则努力适应多元文化和新的思想。在这个时代的变革中，集体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英国人需要选择的是保持还是改变怀旧的英国神话。以往辉煌的、优雅的英式贵族生活不复存在，作为达拉顿勋爵管家的史蒂文斯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业务能力都成为过眼云烟，让他无所适从，陷入了自我怀疑，在事业上迎来重击。对于

一些人来说，继续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坚持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成为一种选择。史蒂文斯代表了这一部分人，他无法适应社会变革，他对传统的怀旧情感导致了对现实的自欺欺人。总的来说，英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帝国霸权的崩溃，社会、文化和政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给每个人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创伤。

### 三、《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创伤的根源

石黑一雄出生于日本，小时候随父母移居英国，和许多第一代移民子女一样，他也受到双重文化的共同滋养。在家里，他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在学校，他结交地道的英国人，接受正规的英国教育。这种独特的个人经历、异国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长日留痕》中，主人公史蒂文斯的个人悲剧源自英美双重文化元素，这与石黑一雄的个人经历有着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

#### （一）“异化”的职业观念

《长日留痕》描述了一个地道的英国白人管家的故事。管家制度起源于法国，但在英国得到了充分发展。“Butler”一词最初源于法语“bouteillier”，指贵族或皇家宴会上的酒官。在英国历史上，只有世袭贵族和受封爵的家庭才有管家。正如美国的牛仔、日本的武士和西班牙的斗牛士一样，英国的管家也极好地代表了他们的社会和文化特征。管家是英国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在六七百年的历史中，英国人严格规定了管家的职业概念和职责范围，并成为行业标准。管家在英国社会具有很高的认可度，被称为“绅士的绅士”。为了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耀，一些管家会致力于保持高度的自律和克己，遵守规则，恪守道德和责任，甚至对精英保持忠诚和信任。在小说《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作为达拉顿府的管家，为英国贵族服务，致力于维护旧式的权力机制。在他看来，能成为绅士的关键在于与主人朝夕相处，结识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和伟大领袖，从而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强调自己地位的外在表现，即尊严；他认为尊严是衡量好管家的最终标准，并将维护尊严视为职业角

色的最重要原则。史蒂文斯将父亲视为尊严的楷模,以他和其他杰出人物为榜样,将工作业绩看得比个人得失更重要。他通过严谨的职业道德自我约束,时刻保持理性,以实现自己的职业尊严和自我价值。然而,他对职业尊严的苛刻要求,抑制了他的情感需求,也让他对平民持冷漠和不赞同的态度。

汤普森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土地社会》一书中指出,直到1922年,英国被视为一个土地贵族国家。在主人公史蒂文斯工作的时代,英国的贵族和地主阶级仍然占据社会的重要地位,掌握着权力的缰绳。因此,英国的贵族可以被看作是霸权主义男性气质的典型代表。作为达林顿府最成功的管家,主人公史蒂文斯自认为在这个显赫的家庭中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尽管史蒂文斯在达林顿庄园被视为出色的管家,并受到其他员工的尊敬,但与英国贵族相比,他微不足道、无法相提并论。实际上,史蒂文斯只能像一个仆人、处于从属地位,无条件地服从贵族主人,他仍然是下层阶级的一员。例如,当达林顿勋爵要求史蒂文斯解雇2名犹太女仆时,史蒂文斯立即遵守了达林顿勋爵的命令。虽然史蒂文斯认为这2个犹太女仆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员工”,并对解雇她们感到内疚和愤怒,他还是不敢与达林顿勋爵交涉、不敢违抗达林顿勋爵的命令,因为他明白在这个尊贵的家庭中,主人的意志高于一切;史蒂文斯还劝说肯顿小姐对此事保持冷静,因为他知道达林顿勋爵的认可对肯顿小姐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史蒂文斯的身份权利是被边缘化的,他在社会中仍然是英国社会底层的一员,无法改变自己卑微的出身。在与达林顿勋爵的交往中,史蒂文斯始终表现得奴颜婢膝,对主人的每一个指令都唯命是从。随着时代的发展,贵族阶层消亡,管家这一职位也渐渐被人们遗弃,最终导致史蒂文斯陷入社会身份迷失的困境当中。

## (二)“异化”的父子关系

在日本文化中,父亲被尊为一个超个人的存在,代表家庭的骄傲和荣誉。父亲在史蒂文斯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拉康提到,人类欲望与他人的关系有关,史蒂文斯最强烈的欲望之一就是得到父亲的认可。史蒂文斯在父亲

的监督和教育下,努力模仿父亲的行为和价值观,特别是对管家职业的追求。然而,父亲只给予史蒂文斯管家的专业教育,却没有教他处理生活中的人和事,更没有给他健康的情感引导。父亲的长期专制教育使史蒂文斯缺乏独立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其人际交往和生活的应对能力受到了限制。史蒂文斯在成为父亲的副管家后,彼此的工作身份更加恶化了父子关系。在这种特殊的工作关系中,他和父亲之间只有任务,忽略了亲情关系的建立。

尽管父亲在史蒂文斯的成长中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他漠不关心的情感态度导致父子之间关系始终冷淡。父亲在弥留之际,史蒂文斯仍然坚持将工作做到极致,其实是想获取父亲的认可,也反映了日本文化中面对困难时抗拒救援的思维。最终,史蒂文斯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成为史蒂文斯心理压力和沉重精神负担的根源,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缺失和异常的父子关系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痛苦和不幸,这种不正常的家庭模式在小说中展示了家庭温暖的缺失和家庭创伤对于父子关系的深远影响。

## (三)“剧变”的社会历史

政治、经济、文化等往往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人亦如此。小说开篇史蒂文斯旅行的年代设置于1956年,这并不是一个随意之举,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时代互文性。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英国撤出中东,损失惨重。大英帝国不仅在战争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损失了往昔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地位,美国随之取而代之。苏伊士运河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英国国民的信心,“日不落”帝国到“日暮”帝国的创伤性体验,使得人们沉溺于过去的辉煌而无法自拔,对现实持有消极态度。小说《长日留痕》使用巧妙的手法将之体现出来,从史蒂文斯面对购买府邸并拥有雄厚财力的新美国主人所表现出的窘迫与种种不适中便可见一斑。

两次世界大战促使英美两国角色颠倒,这是英国人无法接受的现实,他们犹豫着、挣扎着,寻求新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试图以一些方式来拯救英国,重建国家实力,重回霸主地位。一些决策者,如《长日留痕》中的达林顿勋爵,错



信德国法西斯主义，再次加剧英国的颓势。而底层人士也在努力寻求改革，以期改善经济状态、恢复帝国实力。但随着科技、市场的全面落后，底层发起的改革也事与愿违，因而，全国上下很快失去民族自尊，陷入麻木。

二战后英国的没落使他们无法面对现实，只能沉溺过去，故步自封，面对现实的窘境，也无法构建新的民族身份，《长日留痕》将这一切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表现出来。法拉戴作为一个占领了老牌英国贵族达林顿勋爵府邸的美国人，与达林顿勋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便是曾经有着帝国荣光的大英帝国与成长起来的美国之间的比照。英国人有过挣扎，也曾经试图恢复自己的世界领先地位，但是不随人愿。小说中史蒂文斯是代表沉湎英国旧日荣光的典型，他的创伤隐射出英国人普遍的创伤情绪；他们一直告诫自己不要追忆过去，心理上却无法控制，导致一直在反复往日的行为，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朝不如昔的感伤境地。

二战以后，美国国力赶超英国，英国日渐衰迷。如同英国无法适应自己落后于其他国家一样，许多英国人也无法适应“寄人篱下”的生活方式，他们选择和史蒂文斯一般，回忆往昔的同时沉浸在往日辉煌的美梦中，逐渐在梦中迷失自己，迷失自己的民族身份。史蒂文斯作为历史发展中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如同活化石般见证了社会历史的剧变，这些剧变使得史蒂文斯的创伤加剧。

## 四、《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的创伤修复

### （一）对职业尊严的认知重构

在前往英格兰西部的旅途中，史蒂文斯偶然发现了一个名为莫斯科姆的村庄，其中许多村民深受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村庄的进一步探究发现，莫斯科姆村的居民具有现代思想观念，展现鲜明的政治观点和独立精神。在这个村子里，主人公史蒂文斯结识了哈里·史密斯先生，两人亲切友好地进行了多次讨论。然而，史蒂文斯和哈里·史密斯先生的价值观和期望却截然不同。莫斯科姆村民哈里·史密斯先生对尊严主题

有着与史蒂文斯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在新时代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追求尊严的权利。相比之下，史蒂文斯仍然坚持二战前的陈旧政治理想，认为只有类似达林顿勋爵或法拉戴先生这样的人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哈里·史密斯先生的观点更符合战后平等主义的理想，他强调每个人都应有追求和维护尊严的权利，而不仅仅是绅士阶层。这一观点在与史蒂文斯的对话中得到了展现，史蒂文斯并未反驳哈里·史密斯先生的定义，而是开始认真思考、逐渐理解并赞同后者关于尊严的观点。哈里·史密斯先生言辞有力且有说服力，打破了史蒂文斯对职业尊严的误解和霸权阶级的痴迷。哈里·史密斯先生的言论使史蒂文斯在追寻尊严的道路上迎来了启示，他开始认识到各阶层、各行业的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尊严。哈里·史密斯先生的尊严观点为史蒂文斯注入了新的生活希望，同时也让他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在与哈里·史密斯先生的交谈中，史蒂文斯渐渐解开了边缘化和从属性的枷锁。

实际上，史蒂文斯可以被视为霸权阶级的受害者，对尊严的错误理解和对霸权的迷恋让他迷失了自我。但哈里·史密斯先生的观点让他逐渐认识到他所追求的东西是虚伪且空洞的。史蒂文斯的反思表明他是霸权阶级的受害者，但也展示了他坦然承认错误的勇气。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分阶级、性别、年龄和种族。通过对职业尊严的认知重构，他表现出了英雄气概，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气质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史蒂文斯逐渐摆脱了职业边缘化和从属性的束缚，颠覆了陈旧的职业概念，构建了一种新型的责任气质，塑造了一种更加包容温和的气质。

### （二）与新雇主平等关系的建立

英国西部热情、自由的社会环境对主人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他之前在阴暗、寂静的达林顿庄园度过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庄园的环境让史蒂文斯养成了谨慎的倾向，尤其在与雇主打交道时更显得小心翼翼，他在庄园的生活也陷入孤立和无所作为的境地。然而，在前往西部的旅途中，史蒂文斯目睹了当地人的各种“戏谑”，领悟到这种“戏谑”是人与人之间温暖关系的关键。他逐渐认识到，世界格局在演变，新的民主

自由运动的浪潮冲刷着违背时代精神和人性尊严的陈旧观念。在这变革中,他开始体会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温情和美好。在与新雇主法拉戴先生建立关系的过程中,这种认知影响了史蒂文斯的态度。史蒂文斯希望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与法拉戴先生的关系,避免过去的挣扎。他看重“戏谑”的作用,将其视为表达亲密和友好关系的有效方式。“戏谑”在人际交往中被认为是传递礼貌、缩短情感距离的手段,是建立或加强亲密关系的有效方式。在此背景下,史蒂文斯希望通过“戏谑”在与法拉戴先生的交往中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表达共同情感,拉近彼此的情感距离。

在英国西部旅行后,史蒂文斯对“戏谑”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现在是更有激情地思考“戏谑”的时候。他深刻意识到“戏谑”是构建人与人之间温情和纽带的关系。这段旅程不仅有助于主人公史蒂文斯修复创伤,还完全构建了他的新型身份气质。小说结尾,史蒂文斯重新审视与新雇主的关系,渴望改变目前的局面。他决定不再做一个唯唯诺诺、优柔寡断的“蜡鼻子”,而是努力与美国雇主法拉戴先生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在与新雇主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史蒂文斯努力摆脱卑微形象,追求平等与和谐。他以更加平等、平和的心态审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自信。主人公不再是抑郁的形象,而是意识到与美国雇主建立和谐关系将带来巨大利益。此外,史蒂文斯心态的转变表明,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新西方文化已悄然融入他原有的文化模式。他与美国雇主建立和谐关系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2种文化的交融。这种自我发现也反映了英国的觉醒,展示了英国勇敢融入国际新秩序的决心。

### (三) 从冷漠走向成熟温和的性格转变

在《长日留痕》中,主人公史蒂文斯长期以来一直努力维持英式尊严,压抑自己的情感。这是因为这种权威、严谨、冷漠、沉默的形象被父权文化定义为理想的男性气质。然而,在旅行过程中,史蒂文斯逐渐转变成了一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男人。在旅途中,史蒂文斯驾车经过一座农舍,一只母鸡突然跑到他面前挡住了道路。为了避免与动物相撞,他紧急刹车。尽管这

只母鸡挡住了他的道路,史蒂文斯并没有责备农妇,而是以温柔的语气安慰她。即便农妇为此多次道歉,史蒂文斯也以温和而平静的声音回应,表达了对这次经历的轻松态度。这是主人公第一次在一个女人面前表现出如此温和、亲切的形象,与之前的冷漠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温和态度不仅体现在对待农妇上,还体现在史蒂文斯对肯顿小姐的态度上。在旅程的最后,史蒂文斯在一家小酒店的茶室里再次遇见了肯顿小姐。一次幸运的邂逅让2人在阔别20多年后再重逢。此时此刻,2人再次相望,仿佛隔了一代人,史蒂文斯的举止表现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与之前冷漠疏离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微笑和温和的态度打动了肯顿小姐,让她感受到主人公以前从未表现出的温柔一面。在对话中,史蒂文斯回顾了过去的时光,一幕幕往事浮现眼前。他们共同回忆了达林顿庄园的点滴,包括勋爵、卡迪纳尔先生以及其他雇员。这样的回忆让他们感受到过去的快乐时光,共同分享着一段美好的回忆。

史蒂文斯对肯顿小姐表达了对她的关心和爱护,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真诚。他甚至在对话中关切地询问了肯顿小姐的婚姻状况,担心她是否受到了虐待。这种关切和担忧展现了史蒂文斯的温柔一面,尤其是当他得知肯顿小姐对婚姻很满意,期待着孙子的出生时,他感到如释重负。他以温和的话语祝福肯顿小姐,表达了对她未来幸福的美好祝愿。在等车的时候,史蒂文斯特别细心地扶着肯顿小姐,避免她踩到水坑。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让肯顿小姐感到非常亲切。整个对话中,史蒂文斯向肯顿小姐传达了他的关心和关爱,呈现出一种新型的气质,更加温暖、体贴和包容。最终,史蒂文斯微笑着告别肯顿小姐,尽管2人可能不再见面,但在这次亲切的对话中,史蒂文斯成功地打破了以往的疏离,拉近了与肯顿小姐的距离。这段对话不仅是2个角色之间的温情交流,也是主人公史蒂文斯性格变化的象征,展现了他在余生中走向成熟和温和的过程。

## 五、结 语

史蒂文斯的创伤疗愈过程是一个复杂而曲折



的过程，他通过自我反思、交流和理解他人的经历和情感，逐渐接受和理解自己的创伤，进行自我疗愈和修复，并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史蒂文斯个人的成长和疗愈，也是对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创伤和痛苦的一种深刻反思和理解。作者虚构了一个遭受打击又重新振作的英式管家，他曾为自认为的机智回答没有引起新主人的会心一笑而焦虑；而旅行之后，他重拾信心打算学习更多新的、符合新主人文化习惯的打趣方式，争取得到他的认同。与文中另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关于“尊严”的宏大议题相比，这实在是一个让人充满意外的、琐碎又小气的闭环，但这一细节真实地回归了生活的本质。《长日留痕》表达了石黑一雄对创伤人群命运的同情悲悯之心，既是石黑一雄文学的里程碑之作，也是启迪我们重新思考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现代经典之作。

#### [参考文献]

- [1] 缪思敏. 论《长日将尽》的创伤记忆书写 [J]. 名作欣赏, 2022 (21): 135-138.
- [2] 刘瑞凤, 齐雪艳. 石黑一雄小说中的创伤书写: 以《长日留痕》为例 [J]. 长江小说鉴赏, 2023 (2): 34-37.
- [3] 梅丽. 从《长日留痕》看英国“二战”后的文化困境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41

(1): 15-21.

- [4] 杜明业. 论《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 [J].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18 (5): 63-68.
- [5] 陈文娟, 王晓婧. 《长日留痕》中的创伤书写 [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4 (2): 39-42.
- [6] 李骥. 《长日留痕》中的怀旧情结及创伤书写 [J]. 电影文学, 2015 (18): 49-51.
- [7] 张颖坤. 伊甸园的幻灭: 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创伤叙事 [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0, 37 (6): 91-97.
- [8] 魏文. 《长日留痕》中的个体记忆与公共历史 [J]. 外国语文研究, 2023, 9 (4): 11-19.
- [9] 陈娇娇. 创伤, 幻灭与静默: 论《千万别让我走》和《长日留痕》中的他者形象 [J]. 大众文艺, 2022 (15): 10-12.
- [10] 何四玲, 刘少杰. 石黑一雄多重叙事策略对《长日留痕》伦理主题的构建 [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3, 36 (6): 67-73.
- [11] 代显梅, 楚梦云. 古典与现代的调和: 以《长日留痕》论石黑一雄的尊严观 [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5 (6): 131-138.
- [12] 徐贞, 张国庆. 尊严、风景与英国性: 《长日留痕》中的民族共同体书写 [J]. 当代外国文学, 2023, 44 (2): 77-84.
- [13] 王悦, 夏光武. 伍慧明小说的创伤书写 [J]. 集美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17, 20 (4): 119-125.

## An Analysis of Stevens' Trauma and Repair in *The Remains of the Day*

YU Xiaorui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Fuzhou UniversityZhicheng College,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The Remains of the Day* describes the family trauma, love trauma, career trauma, and war trauma experienced by the protagonist Stevens, and describes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repairing the trauma during Stevens' 6-day driving trip, and how he finally achieves self-reconciliation. *The Remains of the Day* expresses Kazuo Ishiguro's sympathy for the fate of the group suffering traumas. It is not only a milestone work of Ishiguro's literature, but also a modern classic work that inspires us to rethink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novel's trauma writing of the protagonist Stevens, interprets his trauma and self-healing process, and then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eal life trauma healing process.

**Key word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Stevens; trauma; repair; Kazuo Ishiguro

(责任编辑 张永汀)